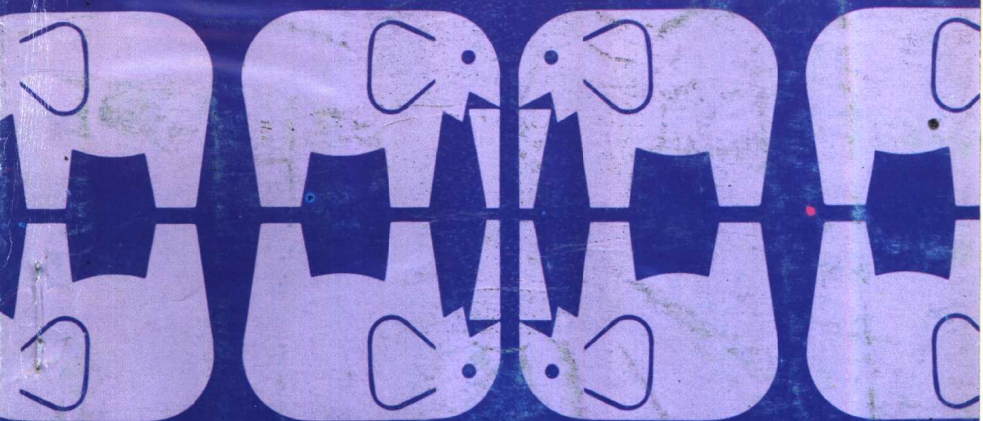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化史丛书

剑与温柔

— 吴越文化

刘苦知



沈阳出版社

剑与温柔

——吴越文化

刘苦知 著

沈阳出版社出版

一九九七年

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

主 编

张岱年

执行主编

朱立元

委 员

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

朱立元 涌 豪

总策划

石铜钧

责任编辑

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

封面设计

曾一中 庆芳

目 录

小引	(1)
一、风帆起处	(3)
二、美丽的蛮夷	(16)
三、遥远的星辰	(28)
四、水的咏叹调	(40)
五、麒麟的家乡	(63)
六、面向大海	(82)

小 引

我们看见那些遥远的星，正闪烁着光芒。我们渐渐淡忘了逝去的光阴，甚至祖先们辉煌过去。但是，那些星体却是伟大的见证。我们所见的光芒，正是遥远的时代所发出，只是我们比祖先有幸，见到了它们。所以每当仰望星空，人们总会浮想联翩。哪怕是愚笨的人，有时也会感叹出美丽的诗句。

文化，是一条长河。我们浸淫其中，品尝，玩耍，浑浑噩噩，或苦苦寻思着终极的意义。吴越文化是地域文化中一只美丽的奇葩。说起她，人们就会想起吴侬软语，就会想起小桥流水人家；那春天田畴里金色的油菜花，那炎夏夜航船上飘来的歌声，那“向晚天欲雪”时红泥小火炉上温热的陈绍，无不让我们在美好的生活里品尝香甜和诗意的美。

但，历史的航船并不是一帆风顺驶来。宝剑是美丽的，威严的，但它也必然沾染着许多英雄的鲜血；花朵的芳香，甜蜜，也许正是因为承受了无数美人的泪水。吴越文化，正是在剑与温柔中迤逦而来，像一位裙幅长摆的少妇，用她那特

有的风韵感染着我们，不温，不火，却又色彩鲜明，恰到好处。诗人墨客的吟咏也就罢了，独夫武士的征伐也无需多提，但历史正是那条蜿蜒曲折的河流，让我们看见了现在，却无法看见它的过去。我们属于此时此地，笼罩我们的正是无法穿透的历史烟云。

剩下的什么本质，内涵，也没什么好多说。让我们坐下来吧，闪烁的星光会化成时间的碎片，撒在我们的身上，并将抽丝剥茧一般地从我们身上渐渐消逝。谁会仰望今夜的星空，谁会有幸见到今天不可及的星体散发出的光芒？他——有福了。

一、风帆起处

——吴越文化的滥觞

人们谈起地域文化，总是吴越并称，似乎从古以来就有这个概念似的。但并非如此，提出“吴越文化”概念这一研究课题的，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江浙的一些学者，他们基于春秋晚期吴国建都姑苏，越国建都会稽，并且两国领土毗连，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，这才在上海成立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，根据当时少量的出土文物和古史典籍，揭开了吴越文化研究的序幕。

吴，古说句吴；越，古说于越。他们同属于越族——“百越”，是“百越”的分支。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，分布于我国的东南及南部，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。

探讨吴越文化，首先必须弄清它们的地理概念。吴的祖先生活在今天的苏南、皖南、浙北一带，与越人在太湖东南一带错落而居，东临大海，西临彭蠡，南至新安口上游，北与南淮夷隔长江相邻。这片地区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吴地。越的最早活动地区在今天浙北及太湖一带。

句吴与于越，互为近邻，在它们的各自发展过程中，既“各有种属”，又相互联系；既“同俗共气”，又各有特点。但三十年代所说的“吴越文化”，是泛指古吴越地区的上古文化，包括新石器时代与整个青铜时代。而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的“吴越文化”是到春秋时期才形成的，在这之前，吴是吴，越是越，吴与越并不属于一个文化区。吴文化与越文化本来是两支独立、平行的单位，那么，吴文化与越文化到什么时候，怎么样形成统一的“吴越文化”呢？为了探索这个问题，首先要分别弄清吴文化与越文的由来。

1. 吴文化的渊源

旧史盛称，商末周初之际，太伯因让王位于其弟，便奔吴，来到太湖平原，与吴人一样，断发文身，建立吴国。但是，田野考古资料证明：吴的祖先早在太伯奔吴之前，就已经在这里世代耕耘。

吴文化的诞生地，在宁镇。这时的文化土壤有两层：下层是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文化，上层是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。

北阴阳营文化的石器都磨得很精制，主要有斧、斨、凿、锄、刀等农耕工具，但渔猎工具很少，似乎以农业生产为主，也开始有了纺织的雏形，只是未见织片遗存。石锄和七孔石刀这类进步的石器，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是首次发现。彩陶是北阴阳营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，主要有红衣深红彩、白衣红彩、红衣黑彩几种，陶器上画的装饰图纹，多画于陶器外部，也有少量的画在敞口盆的内壁。

在宁镇地区，晚于北阴阳营文化层的遗址中，有良渚文

化与大汶口文化混处现象，带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后的某些特点。

湖熟文化是南京博物院于 1951 年 3 月在江苏省江宁县湖熟镇最初发现的。经考察，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址在江苏、安徽的长江沿岸多有发现。现在，常将湖熟文化称做先吴文化。

湖熟文化是一种早期的青铜文化，起点似和中原地区殷商早期时间相近。出土了石器、骨器等生产用具，又可看做是北阴阳营文化的继续。陶器变化较大，炊器出现了鬲，腹部常带角状把手。而几何形印纹陶与原始瓷的出现，又是商代南方文化的普遍现象。

湖熟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小件青铜器，如小刀、渔钩、镞等等，还发现了一件炼铜的陶钵，钵内粘有一层铜液，表明当时已能制造青铜器，故而，也有人称湖熟文化为早期青铜文化。

青铜是自然铜（红铜）与锡的合金，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，一般要经过使用自然铜的过渡阶段，这个阶段称作铜石并用时期。北阴阳营第四层是新石器时代，毫无红铜痕迹，而且整个文化水平远不如良渚文化，但紧接着的第三层却一越而进入青铜时代，这除了由于外族输入之外是难以作其它解释的。

事实上，宁镇地区的地理位置与中原较为接近，受中原的影响在所难免。在湖熟文化中，我们也可略见端倪。在北阴阳营第三层中，发现了有龟甲、牛、羊的肩胛骨。商朝，龟甲、牛羊的肩胛骨多用来做占卜的工具，用火烧这些甲、骨，根据烧出的纹路来占卜凶吉。北阴阳营中出土的这些甲、骨都有火烧的灼痕，说明它们同样也是被用来占卜。这一习俗

分明是受来自中原商族文化的影响。

由此看来，宁镇地区的文化更接近中原文化，而与太湖地区及宁绍平原有十分明显的差异。即先吴文化高于先越文化，而逊于中原文化。也可以说，宁镇是吴国的发源地，而宁绍平原、杭嘉湖及太湖周围，包括后来成为吴国属地的苏州地区，当时都属越文化的范围。

2. “太伯奔吴”与“吴为周裔”

太伯是周王古公亶父的长子，周王朝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，古公亶父的王位，日后理当由太伯继承。但古公亶父偏爱幼子季历，但这一做法不合乎礼制，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说：“季历贤，而有圣子昌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。”为了成全父亲的愿望，太伯与其弟仲雍商议一起出走，于是“乃奔荆蛮，文身断发，示不可用。”太伯与仲雍来到吴地（今无锡梅里一带），尊崇吴地风俗，断发文身，以吴地族名“句吴”为号。

但是，“太伯奔吴”这段传说，却遭到了史学家们的怀疑。有人从怀疑“太伯奔吴”进而否认吴为周裔。近年也有学者认为“吴为周后说”完全“无稽”，是在吴成为中原大国的“夫差时代”编造出来的。总之，对“太伯奔吴”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，一是认为在古公时代，太伯、仲雍已经到达江南；另一是压根儿否认吴为周裔。

但不管这两种观点如何，《史记》的材料包含着一个基本事实——吴国的统治者确实是周人的后裔。“吴为周后”说，早在夫差时代以前已经存在，而且并非吴人自吹。后来的考古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宁镇及其附近地区大量西周墓的相

继发现，纠正了文献记载的一个错误，即周人初到江南的时间不是商代、先周的古公时期，而是西周成王、康王年间，因为现已发现的江南周文化遗存，其年代未有早于这个时候的。按一般情理推测，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青铜器，在江南出现的时间应该略晚于中原。这些考古新发现还纠正了一般文献记载的另一个错误，即周人初到江南的地点，不是无锡、苏州一带。而是宁镇至皖南一带。

那么，太伯、仲雍的奔吴，对吴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？

首先，促进了吴文化与周文化相融合。虽然太伯、仲雍到吴地后，断发纹身，从表面上看是遵从吴地文化，但在这后面，周文化的影响，涉及到吴文化的方方面面，与土著文化相融合，形成了新的发展了的吴文化。

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的传入，促进了吴地农业的发展，筑城技术推动了吴地城堡乃至日后城市的出现与发展。

吴地在太伯来前，铸造业并不发达，工艺也很落后，只能铸造小型的青铜器，太、仲为吴地带来先进的铸造技术，使吴在周初，青铜铸造业达到顶盛。许多青铜器与中原所造器物相差无几，吴人在吸收中原先进技术的同时，并不照抄照搬，而是把自己的丰富想象和智慧运用出来，如在鬲上加上羊角把，在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上也以本土风格为主，器形仿中原形制而饰以曲体小曲，风格细腻，使用云雷纹、蟠虫纹等具有南方特点的纹饰，将中原文化有机地融入本地文化之中。

3. “越为禹后说”

史学界过去一直有“越为禹后”说。此说最早见于《史记》。

《史记·夏本纪》说：“十年，帝禹东巡狩，至于会稽而崩。”篇末又指明会稽地望：“禹会诸侯江南，计功而崩，因葬焉，命曰会稽。会稽者，会计也。”

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说：“越王勾践，其先禹之苗裔，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。封于会稽，以奉守禹之祀。文身断发，披草莱而邑焉。”

《越绝书·外传记地传》说：“昔者，越之先君无余，乃禹之世，别封于越，以守禹冢”。又说：“无余初封大越，都秦馀望南，千有馀岁而至勾践”。无余之名，始见于此。

“越为禹后”是否真实，史学家们也莫衷一是。但司马迁作为一位严肃的、富有实录精神的史学家，《夏本纪》与《越世家》关于禹、越的记载，当时应有先秦遗篇作为根据，不会凭空捏造，此其一；其二，全国各地关于禹的胜迹传说很多，而以绍兴为最盛。

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余外传》载：“至少康，恐禹亦宗庙祭祀之绝，乃封其庶子于越，号曰无余”。又言：“余始受封，人民山居，虽有鸟田之利，和贡财给寺庙祭祀之费。乃复随陵陆而耕种，或逐禽鹿而给食，无余质朴，不设宫室之饰，从民所居”。此后，越部族以会稽为中心，逐渐发展强大，形成了具有鲜明色彩的地域文化，为以后吴越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。

4. 越文化的摇篮

据史学家研究，越国“夷俗”最浓，国名却毫无“夷俗”痕迹，对其国号“戊”的执着坚持，象坚守某一神圣的原则。传世与出土的越国铜器铭文，从不自号“於越”或其他任何对音，而是清一色的一个“戊”字，其单音达百分之百。仅此一项，就足以推翻“越人自名於越”的二千年成说。那么，於越（于越）之名最早见于何时呢？

《春秋·定公五年》：“於越入吴。”历史上，于越又称“大越”、“内越”，在百越中是发展较早的一支，文明程度也比较高。据《国语·越语上》记载，早期越人的活动范围南至于今天浙江诸暨，北到嘉兴，东到宁波鄞县，西到太湖。

早在旧石器时代，越的先民就已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。1963年，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建德县（原寿昌县）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和哺乳动物的化石。经测定，这枚人类牙齿化石距今已有五万年之久，属新人阶段。与现代人的身体结构，牙齿结构差别不大。这个被称为“建德人”的古人便是目前已知的越人的最早祖先。

新石器时代，越文化的土壤又培育出河姆渡文化、马家浜文化、良渚文化……其中，以河姆渡文化最为著名。河姆渡文化遗址，位于杭州湾以南宁绍平原上的余姚县河姆渡村。毗邻四明山麓、坐落在姚江之阴。遗址的东、西两面是广袤的平原，周围有湖沼、丘陵、山地，山青水秀，地肥水美，既可渔猎，又可农耕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古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。经1973年和1977年两次挖掘，测定遗址的总面积为40,000平方米，现在已经挖掘了2,600多平方米，河姆渡文化遗址上下叠积着四个文化层，其中，第三、四层内容

丰富，特征鲜明，面貌崭新。据碳十四测定，第四文化层年代距今约七千年。

1979年，浙江省考古研究工作者根据新的发掘材料，认为河姆渡四个地层之间，前后的因袭关系很清楚，一些基本的文化特征贯串四层的始终。主张把四个文化层都命名为河姆渡文化。其第四层为河姆渡第一期文化，第三层为河姆渡第二期文化，第二层为河姆渡第三期文化，第一层为河姆渡第四期文化。第一、二期（即第四、三层）为早期；第三、四期（即第二、一层）为晚期。河姆渡文化的范围主要在浙江宁绍平原东部，宁波的妙山八字桥有河姆渡第一、二层文化遗存；舟山群岛的定海有第二层文化遗存；余姚牛山和慈溪童家岙有三、四层文化遗存；唐家墩有第一层文化遗存。此外，余姚的茅湖、鄞县的辰蛟、丹山的白泉等地也都有河姆渡文化遗迹。河姆渡遗址的发掘，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古代越人的生活画卷，也把越文化诞生的遗痕展示给我们。

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、骨、木、陶质的各种生产工具，达数千件，许多骨、木器具式样新颖，制作精巧，在我国还是首次见到。其中，成批的骨耜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，也是河姆渡文化典型器物之一。这些骨器多数是用牛、鹿等偶蹄动物的肩胛骨制成。在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中，第四层不但年代最早而且堆积最厚，内涵最丰富，仅骨耜就出土了一百七十六件。并且，第一期挖掘就出土十多万片陶片，可复原的陶器和骨器、木器、石器工具达千件以上。

稻作文化是越文化的一个标志。第四层还发现有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、谷壳、稻秆和稻叶等的堆积，一般厚20—50厘米，最厚处超过1米。其数量之多，保存之完整在新石器

考古史都是少有的。河姆渡稻谷遗物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，也是亚洲最古老的水稻实物遗存。这说明当时的农业已进入耜耕——熟荒耕作制阶段，告别了火耕——生荒耕作制阶段，河姆渡稻属籼亚种晚稻型水稻，说明我国是世界上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

第四层还发现了大量的木桩、梁、柱等木构残件，总数有数千件之多，其中有大量榫卯残件。学者判断这是属于干栏式长屋的构件。这种长屋长度在23米以上，进深约7米，全体氏族成员都住在这里。这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榫卯结构和干栏式建筑。所谓干栏式建筑是以桩木为基础，其上架设大、小梁以承托楼板，构成架空的建筑座基，上边再立柱、架梁、盖顶、建成高于地面的楼层。这是江南多雨地区有代表性的建筑形式。

在第四层中，彩陶的烧成，木桨的使用，玉质和象牙制作的艺术品等，都令人叹为观止。在第三层中，出土了一件瓜棱形圈足木质漆碗，外表有薄层朱红涂料，微显光泽，经用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，鉴定为生漆。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涂漆制品。在第二层中，发现一口木构浅水井，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井遗存。另外，第四、三层中出土有玉质的玦、璜、管、珠等，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玉器。

拥有丰富的原始艺术，是河姆渡遗址令人瞩目的特色。河姆渡人用捏塑、雕刻等办法，制作了大量陶、骨、木、象牙、玉石等原始艺术珍品。其中象牙雕刻尤为精致。河姆渡的艺术风格是写实朴素的，只有鸟的形象富于幻想，是写意的，变形的。在河姆渡人的精神生活中，鸟占有特殊的位置。这从文明时代的吴越人崇拜鸟图腾来看，河姆渡人也可能有对鸟

的图腾崇拜。

河姆渡文化的发现，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的最重大突破。以往，人们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。河姆渡文化证实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多源性，证实了长江下游是我国早期文化的另一个中心，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。

继河姆渡文化之后，在杭州湾以北，太湖周围地区先后发现了罗家角文化遗存，马家浜文化遗存，良渚文化遗存，它们之间有着相互继承的关系，都具有原始稻作文化的特点。越的先民们，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一点点地开垦，一步步地迈进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越文化。

5. 吴、越文化的融合过程

吴、越二国的具体历史活动，我们只能从两个层面来考察，一是文献的，即史籍史料的记载，另一个就是考古学文化层的判断。那么，最早见于史书的二国具体历史活动是何时呢？是春秋晚期，这时“信史”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出现，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方面的根据。至于这以前的历史面貌，便很难说清楚了。有一点，阖闾建都于姑苏、勾践建都于会稽，这是确凿无疑的。西周时期，吴国的政治中心在宁镇，其统治势力也没有发展到太湖地区。考古工作者在宁镇地区及其北岸沿江地带，以及邻近的皖南屯溪等地，发现大量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，及其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诞生的吴文化遗存。这说明，西周时期，吴国的政治中心，不是在太湖地区，而是在茅山以西的宁镇地区，势力及于安徽滁河流域与新安江上游。因此，有些学者称西周时期宁镇地

区的考古文化为吴文化，而把太湖地区的考古文化称为越文化。吴、越文化的融合发生于春秋时期。大约在春秋早期，宁镇地区的文化面貌产生明显的越化倾向，而在太湖地区，青铜文化由西向东渐次发达起来。

先谈宁镇地区的越化问题。

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资料判断，宁镇地区尤其是吴文化最集中的镇江地区，文化面貌曾在春秋早期发生突变。

商周时代随葬品以青铜礼器为主，夷人也常有青铜器随葬。太湖、钱塘江水系的越人随葬品以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为主，青铜器很罕见。镇江地区土墩墓第一期有大量青铜器，第二、三期完全不见；第一期原始瓷品种较少，多见原始瓷豆，这与中原地区西周墓的情况一致。到第三期，原始瓷突然进入鼎盛期，器形多样，食用器以碗为主，瓷豆完全消失。

鬲是中原商周文化的重要炊器，也是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主要炊器。镇江地区的湖熟文化也以鬲、鼎为炊器。到了西周时期，即土墩墓第一期，鬲仍很普遍，第二、三期突然消失。鼎虽为三个时期所共有，但第一期的鼎带有角状的把手或钩形的装饰，这是宁镇地区陶鼎独具的地方特色，到了第二期也突然消失殆尽，第一期原无釜，到了第二期，釜突然取代了鬲，而且连鼎都釜形化，而消失了原有的地方特色。

炊器绝不见鬲是太湖、钱塘江水系越人文化的传统特点。而釜，一直是这一带居民的习用炊器。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釜，出土于大约七千年前年河姆渡第四层遗址。河姆渡文化釜形多样，是当时居民最主要的炊器。在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，宁镇这块丘陵地带，仍以陶鬲为主要炊器，到了春秋早期，突然以釜代替了鬲，与东边的太湖地区取得了完全